

宣漢文史資料

第九集



目 录

序言	(1)
我参与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会的回忆	王上修 (4)
一. 解放前夕的宣汉形势	(4)
(一) 国民党垂死挣扎的一个骗局——农地减租	(4)
(二) 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7)
(三) 人心恐怖，社会动荡	(9)
(四) 人民负担重，渴望解倒悬	(10)
(五) 国民党组训地方武装，妄图负隅顽抗	(11)
(六) 宣汉县国民党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监控	(13)
二. 筹划维持社会治安的思想准备和活动	(13)
(一) 争取社会势力参与维持治安的考虑	(13)
(二) 筹划维持治安迎接解放的秘密活动	(15)
三. 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的成立	(19)
(一) 国民党败兵的溃逃	(19)
(二) 国民党宣汉政权的覆灭	(20)
(三) 宣汉县维持会的成立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21)
四. 宣汉县和平解放	(24)
(一) 筹备欢迎解放军，争取雷雨苍等投诚	(24)

(二) 欢迎解放军入城, 宣汉全境和平解放	(27)
五. 宣汉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和维持会的结束	(34)
六. 对宣汉维持会的历史结论	(38)
1949 年宣汉解放及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	
.....	冉崇育 (45)
一. 概述	(45)
(一) 形势	(45)
(二) 维持会成立	(46)
(三) 解放军入城	(47)
(四) 县人民政府成立	(49)
二. 资料辑录 (文电)	(49)
(一) 宣汉县维持会成立及对县内工作安排, 共九件	(49)
(二) 解放军入城及维持会对县内工作安排, 共九件	(55)
(三) 一九五〇年元旦宣汉人民致敬电二件	(62)
(四)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致宣汉函电四件	
.....	(63)
(五) 对开江、万源、通江三县的争取工作函电八件	(66)
(六) 同雷雨苍往来信函五件	(71)
(七) 王家棣等同志来县建立人民政府和宣汉维持会结束工作二件	(73)

为宣汉县维持会落实政策的有关文件	(75)
一. 中共宣汉县委统战部关于对原宣汉临时治安维 持会人员按起义投诚政策对待的请示	(75)
二. 中共宣汉县委颁发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领导小组 对“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的情况调 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	(78)
三. 中共宣汉县委关于对“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 员会”定为起义组织的请示	(86)
四. 中共达县地委地委关于对“宣汉县临时治安维 持委员会”定为起义组织的请示的批复	(87)
五. 中共达县地委统战部关于同意宣汉县原“民众 自卫总队”改定为起义部队的批复	(88)
对 1949 年解放宣汉的部队番号的考订	廖乐山 (89)
附：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工作人员及其名单	...	(92)
编后记	(103)

序 言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在 1949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获得了民族大解放。我们宣汉在当年是怎样解放的？回顾那段历史，必然要注意到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在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

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简称宣汉县维持会）从 1949 年 12 月 11 日应时而生，至 1950 年 1 月 15 日宣告结束，历时 36 天。在宣汉县的历史长河里，不过是一簇转瞬即逝的浪花，可是它却是国民党在宣汉反动统治覆灭的目击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宣汉建立人民政权的迎接者，是“仁政必兴，苛政必亡”的历史规律的见证人，也是在旧政权已经消失，新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实实在在地代行了人民政府职能达一月之久的县级组织。

宣汉在解放时，因有这个组织的作用，使宣汉人民免予战祸；使公物，公粮，档案，武器和船舶、邮电等交通设施，得以保存，使全县 3800 余人枪的反动地方武装，起义投诚，静待接收；使开江、万源、通江等县国民党的党政人员和团队，放弃抵抗解放军的反动计划，投向人民；促成川东北大片地区，兵不血刃而和平解放，这些就是宣汉维持会的历史贡献，也是我们搜集编印这本史料的理由，因为对历史有过贡献的人和事，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宣汉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受到封建王朝的压迫

时，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如农民王三槐、冷天禄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农民袁廷蛟领导的农民反贪除弊，清粮减赋斗争；马洪峩领导的南坝群众打盐店，围县城，反对冉氏大地主垄断东乡盐业市场。当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转折点时，一些开明人士，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弃旧迎新。如辛亥革命时期，官绅冉崇根、景少柳，和知识分子石体元、王维舟等为首领导组建的东乡军政府，驱逐清知县吴巽，推翻了清王朝在县的统治，使宣汉人民未受兵燹之苦，即从封建帝制过渡到民国。在民国时期王维舟又领导川东游击队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抗日战争时期，宣汉人民反对国民党接兵部队虐待壮丁的斗争等，均取得了重大胜利。

生而为人，不可能从母腹中生下来就是革命者。其思想认识要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和时局更迭的影响。这正是宣传教育能树人的原因。且“闻道有先后”，进入革命自然也有早迟。我们不可以把当年领导东乡辛亥革命的人们，说成是投四川保路风潮之机。现在从参与“宣汉维持会”工作的主要成员看，几乎与民初东乡军政府组织者相类似。故不能以该维持会成员的家庭出身，片断政历，而予以否定。因该维持会做了大量不能抹煞且有益于宣汉人民解放事业的工作实绩，终于在198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宣汉县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县委统战部、县委颁发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工作领导小组、县政协党组，根据中央、省、地各级党委的指示，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报经县委批准，为该维持会纠错平反，再上报中共达县地委审批，定为起义组织。维持会的成员，包括原自卫总队官兵，均按起

义人员对待。这是宣汉县落实统战政策的一件大事，它体现了党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等政策落到了实处。这个政策，曾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起过瓦解敌人正规部队的作用，现在也还能调动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曾是维持会成员及其后人的工作积极性；也能安慰已经死去的成员和他们的亲属与亲友，激发他们对党的热爱。

悠悠蒲江西逝水，浪花也淘去若干俊杰，其是非成败，都有过定论。宣汉维持会的功过得失，也应该让人们根据史实，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值此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大庆之际，为纪念宣汉和平解放 50 周年，现将有关宣汉维持会的史料，编辑成册，以飨读者，并存史焉。

政协宣汉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二日

我参与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会的回忆

王上修

一、解放前夕宣汉的形势

(一) 国民党垂死挣扎的一个骗局——农地减租

1949年4月，伟大的中国人解放军，横渡长江天堑，直捣金陵蒋家王朝的巢穴，随即向未解放的中国西南部进军，犹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国民党部队起义的起义，溃逃的溃逃，红旗很快插到四川省周边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了中国新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时，四川省正处于四面楚歌之际，省主席王陵基力图负隅顽抗：一是积极加强巴山防线的军事布置，并把川东北的县长，一律换成军官，以便组织地方武装抵抗解放军；二是组建绥靖工作队，分布各县城乡，对共产党地下人员及进步人士严密监控，并组训大批乡丁；三是实行所谓“农地减租”，“换约”，“保佃”，标榜他也在关心民瘼，为贫苦农民减少负担，以笼络收买人心，进行反共。

1949年10月，我是以四川省农地减租督导员身份，由省派回宣汉督导开办农地减租工作的，因而有机遇参加家乡临解放时的起义组织“宣汉县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秩序，迎接解放军及和平解放宣汉，尽了一点微力。也使我由一个国民党政府职员，转变为人民政

府干部，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能不说这是幸事。

当时四川省的农地减租，也号称“二五减租”，即按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规定：地租按田地常年正产物总量，地主收租375%，其余625%归佃户所有。如地主收租超过规定，应按比例照减，并不准夺佃，说这是在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减租保佃政策。1949年9月，四川省成立农地减租委员会，划拨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得到的美援款，作为四川开办“农地减租”的经费，以硬币支付减租办公费和减租工作人员的工资，限期三个月结束。减租工作的实质是：在国民党“戡乱”军事节节失败，在大陆即将覆灭的前夕，王陵基一伙，企图以减租的小惠收揽人心，欺骗农民，支持他扩大反共武装，征兵征粮，进行内战，巩固其在四川的统治，以挽救国民党的灭亡。

我于当年10月初，由四川省田赋粮管理处调到省减租委员会，派任宣汉县减租督导员。在离省之前，还集中学习所谓《四川省农地减租条例》及租佃登记、减租换约等文件。与会人员都是心态忐忑，议论纷纷：“减租怎能改变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痛恨？”王陵基还在学习会结束时，号召各督导员，查报各县亲共的进步人士。但谁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想的是把预发两月120元生洋的工资领到手，到县去转一圈，在当地县政府领到第三个月的工资后，回省交差了事。其时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再紧，成都的公教人员，还是彼此在暗中传播：“北京已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只是没有看到中国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罢了。我的弟弟王述熹在三台川北农工学院来信说：“时局如斯，我已选择了前途，

哥哥不要久在宦海中浮沉……”我知道他在对我暗示什么了。（述熹，解放前夕正在农工学院读书，在校内参加中共地下组织，解放后任川北行政区团委书记，后任中共三台县委宣传部长）。我离开成都经重庆回县，当时重庆的银行街，已被特务放火焚烧，宪警戒严，人人恐怖，咒骂连天；我不敢久留，花了80余银元，为当时宣汉女中买了教科书（因女中校长是我妻罗丽元）赶车到达县，再运回宣汉。回到家中，到是一堂欢喜，但一谈到时局，都不免忧心忡忡，时特务大造“解放军与当年张国焘一样乱杀人”的谣言，这是宣汉政要和富绅巨商等上层人士，最害怕的事，至于其所造“不但共产，还要共妻”等谣言，相信的人很少。

我在家休息三天，在城内的“小花园”、“德生”、“觉园”和商会、茶馆等处转一转，听一听城乡人民的议论。第四天料想省减租会专车运送的减租布告、减租条例和登记换约等表册，已经到县，便去与县长刘腾蛟商量选任减租督办员、登记员问题。（三个乡一个督办员，每乡一个登记员）县长是负责行政的，我是负责业务的。他力求督办员由民政、建设科长和各区区长及不设署的区指导员兼任几名，登记员也要绥靖工作队员兼30名，其余才由我提名委派。（宣汉当时行政区划是57个乡7个区）我提的都是中小学教师和待业的大专毕业生。这些人员经过集中学习一天减租文件及实施办法后，分派到各乡，开展宣传、减租、登记、换租约等工作，时督办员工资每月生洋40元，登记员工资每月生洋20元。所以他们都愿意参加减租，实际是为了可以得到银元。但刘腾蛟则只给他们每人发一半生洋，一半谷条，把留下来的银元包括县区乡的办公费，约有3000元，作他

准备逃跑之资。开展减租方一月，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公署重庆行辕科长郑稷熙（万源人）突然以视察农地减租工作名义到县，实际是来命令停止减租，但又不敢公开，给我和县长密谈。其理由是：减租会伤害大粮户利益，打击他们对“戡乱”的支持；减租又把粮食分散到农户，征集军粮更加困难。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政府在总崩溃前夕，不仅是顾此失彼，张惶失措，朝令夕改，欺骗人民，而且也在为统治者及其富豪撑腰壮胆。在此期间，郑还想策动宣汉的“四川建设协会”会员（川建会是四川上层人士组织，一说是张群的政治组织），组织地方武装，上山打游击，抵抗解放军，若失败即向乐山一带逃跑的阴谋。县内李金波，刘仲明，张心田，陈竟为，牟鹤昌，程润琴，张贯一，廖春煊和我等十多人，都是会员。知道这是当时西南行辕在作最后挣扎的布置，都不听他那一套，策动遂没有成功。而宣汉的减租工作，就停留在口头上，大部分地主地租未减，我也就不管不催，听之任之。十一月中旬，局势急转直下，督办、登记员等，各自急于回家，连减租的口号，也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消逝，我也不向成都市减租会填寄减租进度报表了。

（二）经济崩溃，物价上涨，民不聊生

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是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的集中表现。当时工农商已面临破产倒闭，财力枯竭，蒋介石又要维持内战的庞大开支，不得不滥印钞票，由日本投降前的5000亿元至1947年7月猛增至16万亿元。之后，每年又成倍发行，造成物价一日数涨。尽管宣汉县政府在1948年6月规定消费用品最高售价：斗米（15市斤）60万元，斗麦36万元，斤盐9万元，百斤煤40万元，斤肉8万元，但

实际市价已超过十倍至数十倍，谁拿到法币，就成为谁的灾难。蒋介石为欺骗人民，缓和矛盾，便废除贬了值的法币，改发关金券，关金券膨胀后，又改发金元券，时以金元券 1 元换法币 300 万元，仅一个月时间，金元券发行数字即高达 6000 亿元。票额直线上升为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由于票额过大，不便流通，宣汉银行又用石印赶制了小额“来人券”进行流通找补。但一面市，又有人伪造，银行不分真伪，遂将大多“来人券”当伪造作废，弄得人民苦不堪言。不几月，物价又日高一日，大小商人不愿进货售货，免担风险，整个市场一片混乱，人们不得不自发地改用硬币——银元，铜元，镍币，甚至清王朝时期使用的铜钱。国民党政府被迫在 1949 年 7 月又废止金元券，改发“银元券”（即可持该券到银行兑换银元），以银元券 1 元换金元券 5 亿元。8 月中旬，宣汉城乡的大小人等，用背篼，箩筐装着金元券在银行门口，人山人海，排列站队去兑换。但等到几个熟人拿到“银元”之后，银行就宣布停止兑换，大都原封不动运回。银元券又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冷遇，市场上就干脆使用历代硬币或以物易物。农民进城不带一包棉花或几斤米，连吃住都有困难。公教人员的薪资，得到的是提不到现谷的拨条，只得把拨条以低价卖给大地主去抵缴他们的田赋征实，其所得价款，还未隔夜，钞票又变成了废纸。当时人们把金元券，银元券等编草帽，折扇子，糊墙壁，扔进垃圾堆，撒在地面上，无处不是，有的干脆把它当废纸烧掉。货币的几经更易和贬值，给宣汉人民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无不怨声载道，一些知识分子埋怨说：“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有的咒骂：“中国（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三) 人心恐怖，社会动荡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造谣诬蔑，当时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包括军政界部分人士，都在埋怨美国还不出兵帮助。有的在计划逃跑，有的在打听解放军到底杀不杀人，也有些人在谈这次解放军的占领区，并没有人外逃，可能共产党政策有改变，也有人谈的是“听天安命，在劫难逃”。有少数人知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识时务，莫逆潮流，或可幸免于难，但非知己，决不谈此想法，怕特务藉端陷害。当时群众一般都有几怕：一怕保甲长拉壮丁，去抵紧急征兵；二怕国民党败兵拉夫和抢掠；三怕警特人员和绥靖工作队裁诬勒索。还有学校师生怕被裹胁，因为专署教育科科长陈克景曾到宣汉中学、师范等校动员师生随国民党军队上山打游击；人口集中的城镇，怕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青年妇女怕败兵流氓侮辱迫害；小商小贩和小食店怕兵痞恶棍佔吃霸賒；也有些人怕战争中烧毁房子；有仇人的怕仇人趁机报复，杀人越货；还有些人没有办法适应这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说与其逃亡在外颠沛流离而死，不如留在家中，死也在本地方。城乡一些富豪，则宰杀猪、羊、鸡、鸭，大吃大喝，怕败兵抢去，又怕将来难得吃到。女儿尚未成人，就提前出嫁，或送婆家暂作童养媳，怕将来失散。坐茶馆的人，谈的都是“国军”被共军打败的消息，但不敢表情，怕军警见到，说是幸灾乐祸，给戴上“红帽子”而被勒索。广大群众真是喜不敢笑，恨不敢怒，茶馆里都贴有“休谈国事”的警告。只有贫苦农民挑抬苦力，裁缝，医生，小贩和“五匠”他们才“无所谓”，他们心里知道，解放军来了，对他们只有好处。一些无业无产的游民，也有乘混乱之机，捞

他一把的想法，跃跃欲试。这样一些思想动态，对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公共财物构成严重威胁，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部分人都在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早些来，从天而降，免使人担惊受怕。若解放军迟迟不来，各种恶势力，必将更要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四）人民负担重，渴望解倒悬

当时宣汉人民的负担重，广大群众甚至中小地主都希望有人来解倒悬之苦。八年抗日战争，已使宣汉各阶层人民疲惫不堪。日本投降后没有获得休养生息，接着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又开始将拉壮丁，征军粮，调服工役等负担加在人民头上。宣汉人民在内战三年比抗日八年的负担还重。1、抗战八年，宣汉征兵不过 26616 人，年均 3327 人，占当年县总人口的 7.18%，而内战三年宣汉拉壮丁达 13261 人，年均 4420 人，占当年县总人口的 9.87%，高出两个百分点，大都是估拉不想去打内战的农村青年。就是这样高的数字，也还没有满足其强加于我县的壮丁配额。2、抗战八年，宣汉征购粮谷 48.76 万市石，年均 6.09 万余市石。内战三年，宣汉负担征购粮谷已达 54.6 万余市石。年均 18.2 万市石，比之抗日战争增加近三倍。此外，为加强巴山防线，修筑公路支援附加粮 10 万余市石，为修建碉堡、架设电话、设置军民合作站等，支援公粮 10 万余市石；还另征收自卫特捐 3258 市石。（上交达县专署 40%，其余全交清剿指挥部）。3、为防共反共，豢养县自卫队、警察队 700 余人；各乡镇警察队，各保分队共约 3000 余人，提供被服给养和武器装备。还强制购买步枪、手枪共 1950 支，子弹共 4285 发，耗资巨万，全由人民负担。4、力役方面，在内战

的几年中，抽调民工修筑宣双公路（县城至双河），整修宣汉至罗江、宣汉至南坝、南坝至樊哈、双河至马渡的人行大道；修建各乡镇街前街后的碉堡、碉楼 800 余座。农民负担的力役工日，不下几十万个，有的工役还要自带口粮。服役中因病因伤缺医少药也死了不少民工。1949 年下半年，抽调 2000 民工，组成 7 个铁肩大队，运送军事物资和伤病员。10 月又紧急抽调 2000 人，不分晴雨，由南坝、土黄、樊哈路线，赶运军粮 2000 余市石到万源，“违者军法从事”。这些力役还不包括临时派拉农民为过往部队运粮、运物、运武器和抬滑竿的零星服役。以上种种，给宣汉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许多青年，为避免拉丁拉夫，都远走他乡，直到宣汉解放后，才敢回家。

（五）国民党组训地方武装，妄图负隅顽抗

宣汉解放前夕，达县第十五区专员公署和宣汉县政府，为抵抗解放，强行组建“宣汉县民众自卫总队”，下辖 5 个常备中队，共有人枪 569 名。（一中队 114 人，中队长方盛德；二中队 114 人，中队长李积成；三中队 114 人，中队长李宗箋；四中队 118 人，中队长冉映如；五中队 91 人，中队长龚渠）。总队部 22 人，总队长由县长刘腾蛟兼，副总队长李绍卿，总队附李宗勋。全县还有警察队共 134 名（警察局 40 名，三个区警察所各 30 名，两个分驻所各 22 名，两个派出所各 10 名）警察局长苗树馨，是早在上半年，眼见危局，藉故逃逸，由唐承述代理局长，主管警务。

1949 年春季，全县枪弹登记共有可使用的枪支 3945 支，子弹 28800 发，其中有公枪 1895 支，子弹 9600 发，包括轻机枪七八挺；有民枪 2060 支，子弹 19246 发（包括手

枪 199 支，子弹 2706 发）。公私枪支子弹，较好的都装备自卫中队和警察队，其余给区乡警察队和保分队。手枪一般是分配在军官和区乡镇长及部份权势人物，作自卫武器。

时乡的警察队 15—30 人，大小 57 个乡镇，合计 1250 余人；保分队脱产保丁，每保 2 名，全县 623 个保，合计 1246 名，都配枪弹。不脱产保丁每甲一名，武器是猎枪和刀矛。此外，每个乡还奉令抽调富绅子弟组建“青年反共义勇军”。派到各乡的绥靖工作队，负责加强乡保警察队的训练，区正加强联编大队（三或四个乡警察队为一联编大队）的训练。

是年 9 月，川东北联防清剿指挥部（罗广文部）还在县属马渡关，设置达、宣、开、城、万五县联合办事处，委派宣汉人雷雨苍任办事处主任，兼副指挥官。雷本人有机枪、手枪七八支，配给他的亲信，按清剿指挥部规定，联合办事处，有权指挥五县的民众自卫部队。

就在那段时间里，达县专员李放六，还派其保安副司令张继任来宣汉，会同县长刘腾蛟，召集党、团、参议会头目和较有名望的参议员开会，强令宣汉组建一个“宣汉民众自卫师”，内定了一些军官，因专署没有枪支、子弹、被服等装备发给，未成事实。如不是解放军进军神速，自卫师可在半年之内成立，宣汉县人民不免又要负担大约 3000 官兵的给养和装备，更要遭受这些反动武装的危害。

这些地方武装的组建，是蒋介石集团安排其配合正规部队抵抗解放军的。万一失败，还想以这些不堪一击的地方部队上山打游击，妄图东山再起，恢复其苟延残喘的反动统治。

(六) 宣汉县国民党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监控

11月中旬，解放军南路已至湖北利川，迫近四川万县，东路已至巫山城口，抵大巴山外围。宣汉城乡人民，有的暗自欣喜，有的忐忑不安。时驻宣绥靖工作队200余人，由县长刘腾蛟兼队长，专署派的军官冯介任副队长，后又加委宣汉人赵鹄立任副队长。县属各乡镇都派去工作组，每组三至五人训练壮丁，监视进步人士，清查“异党”，时各乡捕人，打人，勒索乡民的事，接踵发生，刘腾蛟还令城乡军警加强戒备，日夜巡逻，盘查行人，又令城乡机关学校，加强宣传《国民党反共公约》，当时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有似“黎明前夕天更黑”之势。时县民教馆长符风，本是三青团员，因收听延安广播，在知识分子中透露消息，被绥靖工作队副队长冯介捕押，刑讯逼供达一周之久，才由李金波，刘仲明，张学道等说情释放。

二、筹划维持社会治安的思想准备和活动

(一) 争取社会势力参与维持治安的考虑

面对宣汉解放前夕人心惶惶的形势，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局势，分析我县国民政府溃散后，解放军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认为最要紧的是维持社会治安，防止混乱。国民党在县的军政体制瓦解后，靠什么维持治安？这使我们不得不分析对全县有影响的各种社会势力。

解放前，宣汉民间的社会组织，既复杂而又交错，既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勾结。一是宗族组织。各族的族长，都是